

薛汉伟 / 著

时代发展 与中国特色

当代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兴起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京大学出版社

96219

D61
115

D632/07

时代发展与中国特色
——当代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兴起

薛汉伟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时代发展与中国特色:当代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兴起/薛汉伟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8

ISBN7-301-03135-1

I.时… II.薛… III.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研究-中国
IV.D61

书 名: 时代发展与中国特色——当代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兴起

著作责任者: 薛汉伟著

责任编辑: 金娟萍

标准书号: ISBN 7-301-03135-1/D·312

出 版 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电 话: 出版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559712 编辑部 62752032

排 印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发 行 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7.5 印张 190 千字

1996 年 8 月第一版 1996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0000—3,000 册

定 价: 13.80 元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世界历史进程与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	(15)
一、传统社会开始向现代社会过渡与“现代社会主义”的诞生	(15)
二、工业革命与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20)
三、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过渡与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	(31)
四、资本主义的大动乱与社会主义的胜利进军	(35)
五、资本主义相对稳定发展与社会主义面临严峻挑战	(50)
第二章 在战争与革命年代社会主义建设的最初实践	(54)
一、“直接过渡”的三个设想	(55)
二、新经济政策的生长点	(63)
三、新经济政策的发展与对社会主义看法的根本改变	(69)
第三章 苏联模式的形成及其随着时代主题的转变而由盛至衰	(79)
一、新经济政策的历史命运和内在矛盾	(79)
二、20年代关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大论战	(89)
三、苏联模式的形成	(98)
四、苏联模式的历史作用和历史局限	(106)
第四章 社会主义面临的时代课题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萌芽、形成和发展	(113)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特征	(113)

二、苏联模式的危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兴起·····	(117)
三、第一次危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萌芽·····	(126)
四、第二次危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	(129)
五、第三次危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	(134)
第五章 中国在当代世界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138)
一、和平与发展·····	(138)
二、当代新技术革命·····	(144)
三、东亚的崛起·····	(148)
第六章 在改革中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和理论上的 重大突破·····	(154)
一、时代的发展与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的提出·····	(154)
二、改革起步：理论上的生长点和实践上的生长点·····	(157)
三、改革初步展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和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164)
四、改革攻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 社会主义本质理论·····	(177)
第七章 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道路·····	(191)
一、激进改革、渐进改革、中国式渐进改革·····	(191)
二、中国式的渐进改革·····	(195)
三、民主取向的政治体制改革与市场取向的 经济体制改革相配合·····	(207)
四、中国式渐进改革的成就和问题·····	(217)
结束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未来·····	(226)
后 记·····	(236)

前 言

本书试图对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特别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兴起,作一个客观的描述和比较符合实际的解释。这个工作并不是少数几个人就能轻易完成的,需要广大理论工作者作多层次、多角度的研究。本书试图强调一个没有被人们充分重视的视角来从事这项工作。这就是:在世界历史进程的总背景下考察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在时代发展中来考察苏联模式由盛至衰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兴起。

一、在世界历史进程的总背景下 考察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

这是本书的基本视角和考察的基本问题。我们深信社会主义将取得最终的胜利,但它决不是从胜利走向胜利的直线式的发展,而是高潮与低潮相交错,前进与后退相更替,成功与失败相交织。要对社会主义的发展轨迹作出大体符合实际的描述,就必须把它放到世界历史进程的总背景下进行分析。这就是说:第一,在世界整体联系中进行考察;第二,在把握住世界历史发展总趋势的基础上进行考察。其实,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方法。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唯物主义的世界历史观,指出: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①,“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8页。

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①。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无论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已经是世界历史性的存在。因此,要考察它们的历史命运,就必须放到世界整体联系中去分析。马克思和恩格斯分析社会主义的科学方法的根本之点就在于: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作为科学社会主义出发点的最重要的事实就是世界历史的整个过程,特别是当前的发展趋势。恩格斯说:“被共产主义者作为自己前提的不是某种哲学,而是过去历史的整个过程,特别是这个过程目前在文明各国的实际结果。”^②

把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放到世界历史进程的总背景下进行考察,可以看到它大体上经历了如下几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与空想社会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现代社会主义是随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而产生的。现代资产阶级和现代社会是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现代无产阶级和现代社会主义也是经过长期的孕育而诞生的。在工业革命以前,现代社会的孕育经历了三个世纪,现代社会主义的开始阶段也经历了三个世纪的发展。这个阶段是资本原始积累的阶段,资本原始积累给广大劳动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灾难,造就了众多无财产的群众,从而产生了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基础之上、反映早期无产阶级利益和愿望的空想社会主义。由于大工业尚未产生,生产力水平仍很低下,因此这时的社会主义还不能摆脱小生产的狭隘眼光,普遍具有平均主义和禁欲主义的色彩。

第二阶段,工业革命与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为科学。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是以工业革命为分界线的。它推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6页。(本书使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的引文均引自该书中文第2版,以下不一一注出。)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11—312页。

会决定性转变,从而推动社会主义发生了两次飞跃。工业革命的发生首先使那种宁可牺牲经济进步也要实现社会平等的空想社会主义失去了存在的根据并把它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三大空想社会主义的阶段;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连三大空想社会主义也不能适应历史发展形势和欧洲工人运动的需要而日趋衰落。但社会主义并没有灭亡,而是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科学社会主义的阶段。大工业的发展,使人们第一次有可能打破狭隘的眼界,对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全面的历史了解,根本变革认识世界的方法。马克思恩格斯继承了人类的文明成果,根据新的事实,创立了唯物史观,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

第三阶段,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的过渡与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资本主义工业化是在自由放任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在没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实现的。1873—1894年的大萧条宣告了自由放任主义的破产,宣告了没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已经过时,证实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无政府状态批判的正确;同时也推动了资本的集中和垄断。工人运动有了迅速的发展,并更具有战斗性和政治色彩,证实了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学说;同时也推动了西方国家加紧殖民掠夺,以缓和国内的阶级矛盾。19世纪和20世纪交替之际,资本主义经历了一个既孕育着严重危机,又开始自我调整的时期;工人运动经历了一个既有蓬勃发展,又没有发生革命的和平发展时期。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和思想界取得了伟大的理论上的胜利;与此同时,它又遇到了来自内部的第一次严重挑战——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挑战。

第四阶段,资本主义大动乱与社会主义的胜利进军。历史进入本世纪以后,资本主义在从没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向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发生了一次发展性的危机,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30年代的大危机、德日意法西斯的上台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这一资本主义大动乱的年代,以十月革命为开端,社

会主义实现了辉煌的胜利进军。但是，社会主义胜利的国家大多是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从世界范围来看也造成了两极分化：一极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另一极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贫穷、落后和不发达。在这次危机中，西方国家对不发达国家的掠夺和矛盾、痛苦的转嫁，缓和了西方国家国内的阶级矛盾，却把一些发展中国家置于毫无出路的处境，从而增强了这些国家工农的力量，造就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主体力量。现实的社会主义作为走向现代化的新道路而崛起。

第五阶段，资本主义相对稳定发展与社会主义面临严峻挑战。当前的新技术革命和新工业革命正在和已经把世界历史、从而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个阶段还刚刚开始，可惜是在不利于社会主义的条件下开始的。西方国家已经度过了大动乱的年代，普遍建立了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的潜力已经耗尽，面临着从计划经济向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过渡的艰难的时代课题。面对这一课题的苏联领导人，在体制改革方面先是长期迈不出大步，后来又坚持没有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没有保持政治的稳定。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终于发生苏东剧变。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面对严峻挑战的中国，在回应时代课题中，兴起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二、在时代发展的总背景下考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兴起

这是本书探讨的重点。80年代以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出现了两件似乎极为矛盾的大事：一是苏东发生剧变；二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突飞猛进。前者标志着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衰败，后者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兴起。这两件事的发生及其相互

联系,只有放到时代发展的总背景下才能深刻理解。

有人几乎完全用苏联或中国的内部原因来说明这些事件。这种方法的不足之处是:尽管它并不否认外因,但却导致对外因的不重视。尽管它重视内因,但却往往把内部因素作为脱离外部环境的封闭系统来研究。这种方法并不符合唯物史观。首先,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社会大变革的外部环境的分析是十分重视的。例如,他们在分析西欧封建主义的形成时,总是强调蛮族对欧洲的征服,加速了罗马帝国的崩溃,促成了西欧封建主义的形成。恩格斯在谈到这一点时说,只有野蛮人才能使一个在垂死的文明中挣扎的世界年轻起来。其次,他们在分析内部因素时,十分重视它同外部环境的联系。例如,他们指出,14、15世纪的地中海沿岸,早就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是,只有在地理大发现之后,资本主义的时代才到来。马克思说:“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在16世纪揭开了资本的近代生活史。”^①在工业革命发生以后,他们进一步强调,各国摆脱了封闭、半封闭的状态,历史从狭隘的、地域性的、民族的历史转变成成为世界的历史,从而提出了著名的世界历史观。历史进入20世纪以后,不仅历史越来越成为世界历史,而且经济越来越成为世界经济,世界越来越整体化,因此,我们更需要在世界的整体联系中来分析苏联模式的形成及其由盛至衰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兴起。在这里,我们无意贬低内因的重要,内因始终是事物变化的根据。但是,我们认为,在工业革命以后,特别是在历史进入20世纪以后,尤其需要在世界的整体联系中、在时代的发展中才能说清楚某个国家社会大变革的动因和机制,更不要说像苏联模式的兴衰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兴起这样的世界性的历史变革。

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是在以战争与革命为主题的时代,在一个被资本主义包围的经济落后的资源大国,为了不惜一切代价迅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67页。

速增强国家经济实力和国防实力而选择的一种社会主义模式。尽管这个模式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弊端,但有过重大的历史作用。选择这种模式的苏联,在军事上,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准备了物质基础;在经济上,取得了震惊世界的高速增长;在文化上,作为走向现代化的新道路和追求理想社会的样板发生了广泛的影响。社会主义不仅争得了生存,而且开始了从一国到多国的胜利进军。但是,随着时代主题从战争与革命逐步向和平与发展的转换,同战争和备战环境相适应的发展战略和体制逐步过时;随着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粗放发展和与此相对应的体制的潜力也逐步耗尽。苏联模式的弊端日益暴露。但是由于各种原因,苏东各国没有及时地、成功地从根本上调整这种发展战略和改革这种体制,从而无力扭转经济增长率不断下降的趋势。到后来,苏东各国不仅在效益方面,而且在经济增长率方面也落后于西方;不仅如此,由于这种发展战略和体制不能对第三次技术革命作出及时的强有力的反应,由于微电子技术等方面的落后,苏联在极尽全力进行的军备竞赛中也越来越失去信心。苏联模式终于衰败。

社会主义要在当代新技术革命和新工业革命的挑战面前站住脚跟并求得发展,首先需要从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如何实现这一过渡就成为最紧迫的时代课题。现在我们认识到,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是现代社会化生产的客观要求,而不管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尽管它们的所有制基础有根本的不同。但两者是通过不同道路走向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是先建立没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然后走向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则是先建立计划经济,然后走向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现在我们深深地体会到后者与前者一样面临着巨大的困难,甚至更大的困难。正如西方从没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向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过渡时发生了发展性的危机一样,东方也发生了发展性的危机——从波匈事件到苏东剧变。

“危机”既包含危险，又包含机遇。正是危机的出现，强烈的忧患意识的形成，推动人们克服陈旧观念和既得利益等各种障碍，去把握机遇，实现模式的转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兴起是以时代的发展和苏联模式的衰败促发的危机为条件的。具体地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经历了三次危机才逐步萌芽、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第一次危机发生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的波匈事件。正是从1956年以来，我们党以苏联经验为借鉴，总结了自己的经验，开始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有的后来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生长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从此萌芽的。第二次危机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文化大革命”不仅没有突破苏联模式，而且它本身就是这个模式的产物，并且把这个模式的弊端推向极端。但这种极端的错误恰恰有助于我们进行更加彻底的思考，推动我国改革开放迈出更大的步伐。正是在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政策，逐步成长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十三大首次对这个理论的系统概括，标志着这一理论已经形成。第三次危机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东剧变。这是社会主义由理论变为实践以后遇到的最严重最深刻的危机。正是在苏东剧变以后，我们的理论和实践有了重大的发展。1992年十四大进一步明确地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作了重要的新概括；1993年，又制定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1994年开始在财税、金融、外汇管理、企业制度和社会保险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

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萌芽、形成和发展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它不仅具有中国特色，而且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它是扎根于当代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为什么要搞改革？为什么要搞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要赶上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而且是马克思

主义同时代发展相结合的产物。从世界范围来看，它的兴起标志着社会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种新的社会主义是和平与发展时代的社会主义，是适应新技术革命和新工业革命的社会主义，是各国各具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三、从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道路来分析 改革的巨大成就和面临的问题

本书认为，这是一个极为重要，但有待于深入探讨的问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兴起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似乎极为矛盾的现象：一方面，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现在已经很少有人怀疑中国在下个世纪中叶将不可避免地成为经济大国；另一方面，我们在改革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矛盾和问题，有的矛盾还相当棘手，有的问题使许多人感到困惑。这些现象需要放到中国在回应时代课题所走的道路中去分析。

从历史上来说，市场经济是在私有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由此产生了一种误解，以为只要实行私有化，就可以顺利地转变为市场经济。苏东在剧变以后大规模私有化的实践表明这种想法是幼稚的。中国之所以能在市场取向改革中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就，首先是因为它开始找到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走向市场经济的成功之路，我们可以把它叫做中国式的渐进改革。

中国式的渐进改革，首先是渐进改革，它与苏东的激进改革形成鲜明对照。苏东的激进改革实行大规模的私有化，立即全面放开物价，采取“休克疗法”，企图从计划经济一步跳到市场经济，结果带来了“和平时期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究其原因是因为这种改革思路具有根本性的缺陷，它忽视了向市场经济过渡将是需要十几年、几十年的长过程，而不是几百天；它忘记了在过渡时期国家在培育市场经济中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削弱或打烂了国家这个

改革中的操纵杆；更为重要的是，它不懂得人们在事先不可能有足够的信息描绘出正确无误的改革蓝图，激进改革无法通过及时的逆转来避免巨大的风险。

苏东激进改革的失败，并不意味着渐进改革一定成功。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曾经进行过渐进改革，由于没有取得成功，从而采取激进改革。中国渐进改革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是因为它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一种选择。它至少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中国的改革起源于以速度为主要目标到以满足人民基本生活需要为主要目标等发展战略的调整。中国渐进改革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它采取了真正提高个人消费水平的措施，消费需求提高，强劲地推动了经济的增长，使改革一开始就得到了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并使人民得到较多的实惠。这同戈尔巴乔夫上台时采取的仍以速度为主要目标、以发展机械工业为重点的“加速发展战略”形成鲜明对照。

第二，以农村改革，特别是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为第一推动力，改革从农村向城市逐步推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的推行不仅带来了农业的丰收，而且带来了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农村改革和乡镇企业的迅猛发展是推动改革的两个先锋，从而使中国改革具有自我推动的特色。这条道路是从中国国情出发、总结了农民的伟大创造而作出的选择，它未必适用于农村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较小、工业资本密集度较高的苏东国家。

第三，以对外开放带动改革，改革开放由沿海向内地逐步推进。中国改革的第二推动力来自对外开放。东亚的崛起，亚洲“四小龙”经济的起飞，几千万华侨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关心和支持，给中国提供了特殊的机遇，促使中国形成了以对外开放带动对内改革的战略。中国把逐步推进的对外开放格局，同地区推进的经济发展格局相结合，允许部分地区先活先富，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从沿海向内地强劲推进。

第四，以公有制为主体，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改革由体制外向体制内逐步推进。一方面，非国有企业的发展，使市场经济因素首先在传统体制外成长起来，在较短时间内造就了一批具有活力的企业，推动了经济的强劲增长，化解了改革中的经济震荡，推动了传统体制和国有企业的改革。另一方面，国有企业不仅对改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保证了国家调控经济和培育市场的能力。这一点同苏东改革有根本的区别。苏东在剧变以前，没有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在剧变以后又把国有企业私有化，政府好像“被掏光了口袋”什么也没有了，失去了培育市场和调控经济的能力。

第五，先试验，后推广，从点和局部做起，逐渐推开。中国式的渐进改革主张“大胆地试”，试验要大胆，推开要谨慎，走一步，看一步。这样可以迅速学到在原有体制中无法学到的新东西，可以避免苏东激进改革在缺乏足够信息的情况下制定详细蓝图以及无法及时逆转而带来巨大风险，可以避免抽象的争论而通过实践来统一认识，可以避免由于立即抛弃旧体制中的一切组织和功能而带来的严重经济破坏。

第六，民主取向的政治体制改革和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相配合。中国式渐进改革的经验表明：没有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无论是经济体制改革还是政治体制改革都不可能成功；没有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的民主取向的政治体制改革，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也不可能成功。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存在着紧迫性和长期性的尖锐矛盾，中国能否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要看能否正确处理这对矛盾。

十多年来，中国很是得益于这种渐进改革，但它并非是有百利而无一弊的方式。事实上，中国式的渐进改革既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也存在着诸多的矛盾和问题，有的矛盾和问题还相当突出；既有大胆的成功创新，又有不少有待于解决的课题，有的课题还相当棘手。例如，腐败的蔓延和国有企业尚未搞好搞活，就是在这种

渐进改革中出现的两个老大难问题。所谓老,是说这两个问题自改革开放以来早就出现,而且早就提出;所谓大,是说解决这两个问题的得失成败,关系到我们党、我们国家和我国社会主义的兴衰成败;所谓难,是说这两个问题是社会主义各国改革中普遍存在的难题,中国式的渐进改革既为这些问题的解决创造了条件,也为这些问题的解决增加了难度。

可惜在模式转换中没有一条有利无弊的道路,我们只能对中国式渐进改革的利弊得失作出实事求是的全面分析,既要充分肯定成绩,又要清醒地看到存在的问题。前者可以使我们增强信心,坚定地继续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后者可以增强我们的忧患意识,下定决心,排除万难,去克服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就的基础上,在解决面临的矛盾和问题中得到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将在既有理论成就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实际进一步结合起来,在探索有待于解决的课题中得到发展。

四、着重从实践上的生长点去分析 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重大突破

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既需要有理论上的生长点,又需要有实践上的生长点。任何一种新的理论,都要从既有的思想资料出发,何况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都是在原有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指导下取得的,因此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更需要重视理论上的生长点。但是不管前人提供的理论上的生长点多么重要,如果没有随着时代发展出现的新的事实,特别是新的经济事实,就不可能有重大的突破和新的理论的产生。在社会主义由理论开始变为现实以后,尤其需要根据新的事实,作出新的实践,来发展马克思主义。无怪乎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后特别强调:“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马

克思主义的重大突破通常发生在前人的某些结论与新的事实和新的实践不完全符合或完全不符合的时候。后人正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从事实出发,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对原有的理论作出修正、丰富和发展。这种重大突破的过程,往往在某些极为重要的方面要经历一个从不完全自觉到完全自觉的过程。开始,人们在采取某些新办法时并没有认识到它们的全部意义,甚至把它们看作仅仅是形势所迫而采取的对策,但实践中却发生了原有理论所始料未及的新情况,从而生长出新的理论。无怪乎列宁最喜欢的一句格言是:“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是长青的。”正是由于不懂得这一点,过去有人把实用主义、经验主义扣在列宁和毛泽东的头上,现在又有人把这类帽子扣在邓小平的头上。为此,提出实践上的生长点这个概念并加以强调决不是多余的。

回顾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在马克思恩格斯以后,社会主义理论有四次重大突破,其中都包含着一个从不完全自觉到完全自觉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在俄国有过两次飞跃:第一次,一国胜利论的形成,特别是其中经济相对落后国家首先胜利理论的形成。列宁在1915年就提出了一国胜利论,但当时的一国胜利论并不包括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可以首先胜利的结论。正是根据二月革命及其以后的实践,列宁才提出了经济相对落后的俄国,可以首先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权,走向社会主义;但当时并不认为俄国一国可以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列宁曾经把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希望同欧洲社会主义革命联系在一起,认为:俄国革命将推动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只有欧洲革命才能巩固俄国革命,并帮助俄国克服由于经济落后面临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困难。在十月革命前后的几年中,列宁反复说过:要么是欧洲社会主义革命很快爆发,要么是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灭亡。但是在俄国反对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的胜利以后,人们看到了一个谁都没有意想不到的结果:既不是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也不是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灭亡。在总结了